

# 论南宋临安的社会生活方式

徐 吉 军

生活方式是指在一定生产方式和全部客观条件制约下的有关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典型形式和总体特征。它包括人们对衣食住行、劳动工作、文化娱乐、社会交往、待人接物等物质和精神生活的价值观、道德观、消费观、审美观以及与这些观念相适应的行为模式和生活习惯。

南宋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引人注目的时期。在这个时期，商品经济得到了高度的发展，尤其是都城临安，许多新的社会因素在萌芽，出现了种种异于往昔的社会新景象。本文试就南宋临安的都城风尚以及社会生活方式，作一些初步的探索，以求正于同好。

## 一

临安商品经济的发展和繁荣，为市民提供了享乐的物质条件，同时也促使人口不断地向临安集中，一些富有的地主、商人、官僚和士大夫也纷纷聚居临安，他们豪华奢侈的生活方式，形成了临安“风尚奢靡”的社会消费意识，出现了一股去朴从艳、好新慕异的风气。人们的衣食住行、婚丧嫁娶和宴会社交、文化娱乐等生活方式各个方面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这种现象的发生是有深刻的社会原因的。在私有制社会里，消费水平的高低需要有一定的个人财产为基础，个人财产的积累也必然要求相应的消费水平，这是物质生活发展的必然趋势。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说：“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82页）但封建社会的礼制，却是以尊卑贵贱的政治身份为依据，用国家立法手段，强制不同身份者遵照统治者的意志过着不同的生活方式。礼制的实施，就是为了使财产的拥有者，“虽有货财，无所设施，是以咸安其分。”（《陆宣公集》卷十二）庶民即使腰缠万贯，按礼法规定，也不得享用不敢享受的生活消费品；有财有势的达官贵人也不例外，都要按照等级名分而生活，不得恃富越分。礼制就是这样层层维护特权，防范特权外溢。

然而这样一个僵滞不变的制度，常常在同私人财产的冲突中遭到破坏。人们的财产增长到一定程度，必然要求相应的物质消费。货币在这里就能显出神通，成为消费者突破礼制所约束的生活方式的媒介。这种现象的大量涌现，就意味着禁令失控，物质生活更新，社会生活方式也随之发生变化。

多问题尚待继续深入地研究探讨，有些问题暂时只能存疑。隋江都罗城的研究是扬州古城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我们相信，通过这一工作，将有助於扬州唐城研究的不断深入。

1986年12月初稿

1987年元月二稿

1987年3月三稿

（本文作者为扬州唐城遗址文物保管所所长）

南宋临安社会生活方式的变化,首先显著地体现在人们日常生活中的吃穿住用等方面的奢侈风气上。时人吴自牧在所著的《梦粱录》一书中,曾多次以较多的篇幅加以叙述,“杭城风俗,嗜奢靡之习,至今不改也”。又说:“杭城风俗,侈靡相尚”。“临安风俗,四时奢侈,赏玩殆无虚日。”以至当时的临安以“风俗轻靡”而闻名于世。王珣也说:“今天下之风俗侈矣,富室高华,僭侈无度,昔尝禁矣,今僭侈之习,连毫而相踵也,销金翠羽壑耗不貲,昔又尝戒之矣,今销毁之家,列肆而争利也。士夫一饮之费,至靡十金之产,不惟豪官为之,而初仕亦效其尤矣。妇女饰簪之微,至当十万之直,不惟巨室为之,而中产亦强仿之矣。后宫朝有服饰,夕行之于民间矣。上方昨有制造,明布之于京师矣。”(《衡轩集》卷十一《丁丑廷对策》)。

都城社会的奢侈性消费,刺激着临安城市经济的繁荣,也促进了都城风貌的改观。马可波罗在游记中写道:“行在乃是今天世界上最大的城市,充满了各式的欢乐,几使人疑以置身天堂”。富人们在室内陈设、衣著、精美饮食以及各种娱乐等方面的要求都能得到满足。城中,“自大内和宁门外,新路南北,早间珠玉珍异及花果时新海鲜野味奇器天下所无者,悉集于此”(《都城纪胜》)。

繁忙的商业活动,密集的人口,以及各地不断涌入的游客都促成了杭州城市笙歌处处,宴饮不断。饭店、客栈、酒楼、茶肆、歌馆一应俱全。……兴旺发达的各色行业,为众多的城市居民,如店员苦力、工匠舆贩、优伶乐工,僧道士以及衙卒、仆隶等等提供了就业和发迹的机会。徽生的。寄食的。钻营的,熙来攘往。

富人放纵声色的影响,市场交易竞争的激萌,市井庸人追逐眼前欢乐的倾向,掺搅在一起,滋生着商业都会特有的好尚虚荣的习气。“富者炫耀,贫者效尤。”(《日知录》卷

十三《宋世风俗》条)如在中秋佳节,城中“虽陋巷贫窶之人,解衣市酒,勉强迎欢,不肯虚度。”(《梦粱录》卷四)至于春节,杭城“缙民男女亦皆鲜衣”,“家家炊宴,笑语喧嘩。”(《梦粱录》卷一)。

市民追求奢华的风气,最先表现在服饰的变化上。服饰是物质生活方式的内容之一,在阶级社会中,它不仅仅是为了御寒暑,满足人类本能的装饰欲望,而且是作为等级的标志而出现。中国历代封建王朝都重视冠服之制,用礼法加以约束,“贵贱有级,服位有等”(《新书》卷一《服制》)。因此服饰的更动一般不大,除非异族入侵,用屠刀逼迫人们改衣胡服。即使是改了朝换了代,服饰也只是稍有异同,正如《阅世编》所说:“一代之兴,必有一代冠服之制,其时尚随时变更,不无小有异同,要不过与世逐流,一新一时耳目,其大端大体终莫敢易也。”

但是,服饰在人们的社交新动中,最外在而又最能体现自己的意趣、财富和身份地位,较之房舍车舆又更易逾制,它是人们最直接、最普遍的自我表现,所以它常常被用来充当新的社会思潮和价值观念的标志,更能敏感地反映出都市士民生活新方式的变化。南宋临安与前代相比,就服饰更新最快。周辉在《清波杂志》卷七中说:“自来孩提见妇女装束,数岁即一变,视乎数百年前样制,自应不同。如高冠长裙,犹虞夏之,当时名大梳裹,非盛礼不施。盖施于今田,未必不夸为新奇,但非时尚而不售。太祖剪辇治器物,盖屋宇,皆务高大,后渐渐微小,首饰亦然。”日见新异的服饰,以致豪贵贱的堤防,流风被及都城社会的各个阶层。宋朝政府对服饰的规定十分严格,从衣着的颜色、佩件头饰的形状大小、特异的腰带,所有这一切细节,每一个场合,每一个不同的阶级和阶层,都由皇帝的敕令一一规定,以求符合典礼仪式的需要。据《宋史》

卷一百五十三《舆服志》记载,太平兴国七年(982)正月,宋帝诏令:三品以上服紫,五品以上服朱,七品以上服绿,九品以上服青,一般庶民则只能服黑白二色。又如腰带,宋帝规定“三品以上服玉带,四品以上服金带,以下升朝官虽未升朝,已赐紫绯,内职诸军将校,并服红鞋金涂银排方,虽升朝着绿者,公服上不得系银带,余官服黑银方团胯及犀角带,胥士及胥吏工商人服铁角带,恩赐者不用此制。”但不论是服色、服式,还是腰带、头饰或其他配件的限制,这些礼仪上的细节,几乎都在富商们与日俱增的狂妄傲慢情况下,直接、间接地破坏殆尽。士民们不仅公然穿着这些违禁衣饰在大街上昂首阔步,而且这些违禁衣饰在市场上公开出售或作为市民们婚嫁时必备的彩礼之一。时人袁说友曾描写当时临安的服饰奢侈风潮,他说:“销金衣饰,顷岁有司屡行禁止,往往法令稍宽,随即纵驰,日累岁以来,其侈日盛。豪贵之家,固习于此;而下至齐民稍稍有力者,无不竞以销金为饰,盖不止于倡优被服之僭也。今都人以销金为业者,不下数十家,货壳充塞,相望于道。”(《东塘集》卷十《禁取销金札子》)。市民们“衣不肯着有缕绦、袖絮、縠、浣濯补绽之服,必要绮罗、纹、绡、麻、丽、新鲜华粲、锦绣绘画、时样奇巧、珍贵殊异,务以夸俗而胜人。”(阳枋《字溪集》卷九《杂著·辨惑》)。临安人吴自牧则惊呼:“自淳祐年来,衣冠更易,有一等晚年后生,不体旧规,喜奇巾异服,三五成群,斗美夸丽,殊令人厌见,非复旧时淳朴矣。”(《梦粱录》卷十八《民俗》)。城中男女,大多数穿着丝绸服装,遍体锦绣,尤其是商家巨贾的妇人们,更是衣著华丽,所佩带珠宝饰物之多,几难以估计其价值(《马可波罗游记》)。当时妇人们施粉黛花钿,著好衣裳,称“鲜妆帕服”(《释常谈》)。重视梳裹打扮,时谓之“修容”(同上)。服装式样变化无常,史绳祖《学斋占

毕》卷二中载:“饮食衣服今皆变古”。乾道四年(1168)七月壬戌,有臣僚向皇帝反映:十多年来,临安居民喜穿边章。

不过从外表衣著,还是可以一眼分辨出达官贵人、富商巨贾与杭州街上一般平民的不同。前者长袍垂地,后者短衫只及腰际,下著淡色长裤。妇女们或著长袍,或著上衣垂达膝部,再加长袖或短袖外套及裙子等,少女或妇女们上街时,以方幅紫罗障蔽半身,俗称盖头(《清波杂志》)。仕女们多左衽按扣,有别于男士之右衽。显贵的男士,多有紫色长袍供平时穿著,另有绣著龙凤、吉祥鸟的长袍供庆典时穿用。此外,上等的衣服多以丝绸做成,亦有以锦缎制成,作为重要场合穿用。一般庶民则多穿麻布衣服,棉花初由南方各路少数农民所栽植,后渐及于江南太湖流域,然仍为昂贵之物。

关于饰物,仕女们的头饰多为簪钗之类,插在发髻里十分美观。高官富贾的贵妇人,宫中的侍妾、公主等则有金银制成的凤凰,以及制作精巧的形状如各种花朵的头饰,亦有戴发髻环及耳环的。杭城这类对于发饰的喜爱和风行,在九世纪时曾给当时的阿拉伯商人很深的印象,有一位阿拉伯游客说:“仕女们上街不戴帽,而是插上簪钗等,有时头发插著多达二十种的簪钗,多有以象牙或珠宝、玉石等制成的”(史华基特《中印关系》)。咸淳末年,奸相贾似道以太傅平章军国重事,禁止天下妇女以珠翠为饰。于是,都城妇女悉以琉璃代之,妇人行步,皆琅然有声。民谣曰:“满头多带假,无处不琉璃”(俞德邻《佩韦斋辑闻》卷三),被封建文人看成是亡国之兆(按琉璃谐音流离)。又如腰带,民间多以玉、金、铜、铁等制成的牌子作为佩饰。甚至价格昂贵的犀角,也趋之若鹜,作成佩饰。官方对腰带“各有等差”的规定(见《宋史》卷一百五十三《舆服志》),在这里只是徒具形式而已。

至于饮食,临安已经不是建炎初年衰败

《枫窗小牍》卷上所说的“鱼虾屏断，鲜适莫构，惟野葱、苦蕒、红米作炊，炊汁许许，代脂供饮”的情形了，而是“侈甚”（《梁梦录》卷十六《荤素从食店》）时人阳枋在《字溪集》卷九《杂著·辨惑》中说：“食不肯蔬食、菜羹、粗粝、豆麦、黍稷、菲薄、清淡，必欲精凿稻粱、三蒸九折、鲜白软媚，肉必要珍饈嘉旨、脍炙蒸炮、爽口快意，水陆之品，人为之巧，缕盒雕盘，方丈罗列”，“凡饮食珍味，时新下饭，奇细蔬菜，品件不缺”，“不较其值，惟得享时新耳”（《梦梁录》卷八《大内》）。马可波罗在游记中也说：“当你看到运来的鱼，数量是这样的庞大，或许会认为无法卖光，可是在几小时之内，竟一售而空。”吴自牧在《梦梁录》卷十六羹条中说：“杭州城内外，户口浩繁，州府广阔，遇坊巷桥门及隐僻去处，俱有铺席买卖，盖人家每日不可缺者：柴米油盐酱醋茶。”从上面这些记载，我们可以看出：这种奢华风尚不仅流行于都城中的上层社会，而且连素以清操自守的寒士也不免追赶时髦。同时也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市民生活和消费水平的提高。

当然由于杭城居民贫富十分悬殊，因此两者之间的吃法也不同，形成了极大的对比。一般百姓以米饭、鱼、猪肉为主，然而这种一般人家三餐多有的食物，对于富裕人家来说则是不屑一顾。在各种盛大的欢宴中或富裕人家的餐桌上，其菜式之繁富多变，较之一般人家的三餐饮食，自是大异其趣。官闱、皇亲贵族、达官巨贾一方面由于天性使然，一方面亦是虚荣心作祟，皆好竞趋奢靡，珍饈美肴，一掷千金。在周密《武林旧事》一书中，更列有二百道以上的美食，足供一次大宴会之用，甚至连上菜的先后顺序，都一一备载不缺。包括四十一道大菜，烧鳊鲙、薑虾米、螺头、炙鸡鸭，……各类鱼、虾、蜗牛、猪肉、鸭肉、鹅肉、羊肉、鹌鹑、鸽子等，不胜枚举。烹饪手法，则

煎、炸、烤、烧、蒸、煮等，不一而足。还有四十二道小果及蜜饯，二十道菜蔬，九种粥饭，二十九道干鱼，十七项饮料，十九项糕类，五十七种点心（包括各类饼干、馒头、包子）；真是令人眼花缭乱，垂涎不已（《武林旧事》卷六《市食条》）。

在住房、肩舆和日用品方面的奢侈现象，也不亚于服饰和饮食。

关于住房，宋朝政府有严格的规定。据《宋史》记载：“凡民庶家，不得施重拱、藻井及五色文采为饰，仍不得四铺飞檐。庶人舍屋，许五架，门一间两厦而已”（《宋史》卷一百五十四）。景祐三年（1036）八月己酉，又作了详细的规定，诏曰：“天下士庶之家，屋宇非邸店、楼阁临街市、毋得为四铺作及斗八。非品官毋得起门屋，非宫室、寺观毋得彩绘栋宇及间朱黑漆梁柱窗牖，雕镂柱础”（《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百十九）。但这些规定在临安，实为一纸空文。根据马可波罗游记的描述，“杭州人民的住宅，建筑华丽，雕梁画栋，他们对于这种装饰、画图以及富有想象力的建筑物，表现了极大的爱好。所以，在这方面耗费的钱财，是极其可观的”。时人江少虞也说：“杭人素轻夸，好美洁，家有百千，必以大半饰门窗，具什器”。且往往是金漆（《宋人事实类苑》）。一般人家如此，富室人家对其起居宅第的营建，更是一掷千金，毫无吝嗇。珍贵的沉香木和檀木，远从热带地区运来，以为主梁支柱之用。地板则铺以上釉的瓷砖，甚至有以银片饰成花卉图案镶嵌的（《癸辛杂识》续集下《倭人居处条》）。至于屋梁外露部分，皆饰以雕刻，画上华丽的图案。更精美的，则在屋顶上饰以黄色、浅绿或翠绿等琉璃瓦片，檐角上翘，檐弯和谐而完美，和周围山林水色，相映成趣。屋檐习用白鹭鸟、龙、凤等陶制动物饰物。而平民百姓则是不准也无力饰用这些物件。

这些富家宅第还皆种有各式各样的奇花

异卉。明人陆容在所著的《菽园杂记》卷十二中载道：杭人在“宋元盛时，习尚繁华，富贵之家，以楼前种树，接各色牡丹于其杪，花时登楼赏玩”。

与这些一栋栋的达官巨贾的第宅相比，一般商家或平民的住宅，是难得如此奢侈的。乞丐或赤贫者大多席地而睡。有幸能得一栖身之地的，也多是六七个人局促于一隅，甚或更多的人，拥挤于一处。街道、市场、房屋可以说处处人满为患。房屋的建造也力求快速、经济、实用。

关于作为交通工具的车舆也是如此。宋朝政府规定：“民家毋得乘肩舆及以银杠导从，肩舆毋得过二人。”（《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百十九）只有具备一定资格的官员才能使用。临安的主要街道，均为石板路，车辆无法通行，故城内车辆极少。自然车辆的僭越现象，不为人们所注目。但作为陆上主要交通工具之一的轿子却大行其道，这方面的僭越现象，却不亚于服饰、住房、饮食等。《朱子语类》卷一百二十八载：“南渡以前，士大夫皆不甚用轿，如王荆公伊川皆云不以人代畜，朝士皆乘马。或有老病，朝廷赐令乘轿，犹力辞后受。自南渡后至今，则无人不乘轿也。”

## 二

当临安市民们的物质需要得到一定的满足之后，愈加渴望精神上的欢乐，希望在丰富多彩的文化娱乐中陶冶情操，得到美的享受，于是，都城各阶级士庶百姓喜闻乐见的文化娱乐生活亦相应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周密在《武林旧事》中说：“翠帘镇幕，绛蜡笼纱；遍呈队舞，密拥歌姬。脆管清吭，新声交奏，戏具粉耍，鬻歌售艺者，纷然而集。至夜阑，则有持小灯照路拾遗者，谓之扫街，遗钿堕珥，往往得之”。歌台舞榭秦楼酒馆，勾栏瓦市，既是新兴，亦是汴京遗风学

样，无怪乎有人直把杭州当汴京了。过去流行的玩意也重新发展起来，既适合宫廷贵族、富商豪民的游玩，又投合于都会小市民无聊时的消闲，于是市民文化大盛，话本、百戏、鼓子词、诸宫调、队舞、小说、杂剧、大曲……应有尽有。

值得注意的是，临安市民对“胡乐”也表示出极大的兴趣和爱好。乾道四年（公元1168年）七月，有官僚向皇帝反映：十多年来，临安喜穿边装，好听胡乐；夜晚，有人吹鹧鸪、拨洋琴，穿黑衣而舞于街头，围观者甚多。

与此同时，旅游之风也开始在临安兴盛起来了。吴自牧在《梦粱录》中说：“临安市俗四时奢侈，赏玩殆无虚日”。马可波罗在游记中也说：“这地方的居民，颇有闲情逸致。在他们一天工作之余，或是一次商业交易了结之后，除了希望带上自己的妻子或情人，租一条画舫或是雇一辆街车，借以消磨闲暇的时光，从中取乐之外，还能有什么东西能吸引他们呢？”从记载当时史事的《梦粱录》和《武林旧事》等书来看，临安一年十二个月里，几乎月月有习俗活动。正月初一那天，杭城“南至龙山，北至北新桥，四十里灯光不绝。城内外有百万人家，前街后巷，僻巷亦然”（《西湖老人繁胜录》）。二月十五花朝节，“湖上游人，至暮不绝”。诗人杨万里有诗道：“户户游春不放春，只愁春去不愁贫。今朝道是游人少，处处园亭处处人”。三月清明又是一番热闹景象。“是日，倾城上冢，南北两山之间，车马阗集”。四月八日浴佛节，五月端午节，七月乞巧节，中元节，八月中秋节，九月重阳节……等等，也无不如此。

商品经济的发展，也促进了社会交往的发达，人们的交往范围已不再局限于与世隔绝的狭窄的小圈里，那种疏于交往的习惯正在得到改变，这便是会社的盛行。由于临安人口稠密和城中各种商贩士庶人物杂处，大大增加了不同阶层人士交往接触的机会，使

他们之间更为息息相关。当时临安城中有许多聚会场所，于是种种团体会社的组织，诸如文学、竞技或宗教性质的会社相继出现。其中著名的有西湖诗社，它网罗了城中名士和四方流寓儒人，竞相赋咏，各逞诗词，对于十二、三世纪中国文学艺术的发展颇有影响。此外，军人武士们有弓踏弩社，风流子弟们有蹴鞠打球射水弩社，奉道者有灵宝会，又有锦体社、台阁社、穷富赌钱社、遏云社、女童清音社、苏家巷傀儡社、青果行献时果社……（《梦粱录》卷十九《社会》），这种名目繁多的会社，为市民提供了众多的社交场所，也创造了广泛的接触机会。

由于都城部分市民的奢靡财富，以及部分居民的闲逸，和社交生活的繁杂，杭州的环境特别有助于礼义的增进和文明生活方式的增长。不过也因此而产生了糜滥淫佚。庄绰在《鸡肋编》卷中说：“两浙妇人皆事服饰口腹，而耻为营生。故小民之家，不能供其饰者，皆纵其私通，谓之贴夫，公然出入不以为怪。如近寺居人，其所贴者皆僧行者，多至有四五焉”。至于临安娼妓之多，足使人认为十三世纪前后的杭州人生活中，淫靡之风已扮演了一个重要的角色。马可波罗说：“此地的人们，绝非勇武之战士，他们的乐趣全在女色，除此之外，全无兴趣，皇帝本人尤其如此。临安娼妓之猖獗，曾使马可波罗大吃一惊，他在游记中写道：“我告诉你一些别的吧，在城里娼妓不敢活动，他们多在市郊一带。为数之多，真可令人咋舌。足足有两万之数，全都赖此为生”。娼妓在杭城遍处皆是。不论是客栈、酒肆、市场、游乐场所、广场及桥边，几乎随处都可遇到成群的娼妓。她们都浓妆艳抹，莺莺燕燕，倚门候客。对于温柔体贴之道，十分娴熟。与各色人等言谈皆能融洽和谐，其烟视媚行，柔语温馨，足使人一旦陷入她们的迷魂阵中，就会弄得如醉如痴，心荡神驰，也无怪乎他们返乡频呼杭州为天堂。真其乐不思蜀之叹。

奇特的是，临安还出现了数百名男妓。他们忸怩作态，涂粉抹脂，亦歌亦舞，与女娼无异。但他们的组织较诸歌妓完备，城外新门乃其聚集之地，（《癸辛杂识后集》禁男娼条）。

上层社会里放荡奢靡的生活，使一些人因此破产，有的陷入堕落，甚至为此丢掉身家性命。（详见《癸辛杂识》续集上《偏僻无子条》；《夷坚志》乙志九《金刚不坏身》）。

随着社会生活方式的转变，也使与之相适应的人生观、道德观、消费观、审美观等各种社会生活观念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有钱就可以享用高贵者的衣饰器用。逾制在实际上已被人们承认为理所当然的事。马克思说：“财产的任何一切社会形式都有各自的‘道德’与之相适应。”（《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431页）恩格斯也说：“一切以往的道路归根到底是当时社会形式经济状况的产物。”（《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134页）金钱可以使人们变辱为荣，以贱易贵，它就有可能凌驾在纲常名教之上，成为人们追求的对象，驱使人们卖身亡命，负义忘恩。凡是利欲横流的地方，那里的观念就要发生动荡，出现“不可思议”的社会现象。

如婚姻大事，自古以来被奉为“人道之始”，最重视“门楣求其称，婿妇惟其贤”（《巢林笔谈》卷三）。但在临安，由于都城商品经济的繁荣，金钱、土地、资产也就成了世人朝思暮想所追求获取的东西。而通过婚姻达到这一目的，则是一条捷径。于是，都城中男女婚嫁不顾门第、等级的悬殊，而以对方家庭是否富有为标准，以能否得到多的聘财、嫁奁作取舍，甚至专门选择富户联姻。据《梦粱录》记载，都城之人在议婚时，先要交换草帖、正帖。在草帖、正帖上，男女双方除了写上三代姓名、官职、家产及本人的年龄、生辰年月外，男家还要详细标明聘礼数目，如金银、田产、财产、宅舍、房廊、山园等；女家则要列具随嫁资

装,如房奁、首饰、金银、珠翠、宝器等陪嫁品。在当时,这是一项通行的习俗和社会风尚,也是固定的程式。“世俗未聘之先议亲定帖,已先具奁房礼数,大数田亩若干,妾使若干,丝缎、金银疋两若干,谓之细数。”(《事文类聚》乙集)很明显,之所以未聘之先,就要详列聘礼嫁奁细数,主要是作为双方缔结婚姻时的参考。由此可知聘礼嫁奁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和对于婚姻成立的作用。

都城中行定聘礼之多,名目之繁,也是前代和当时各地所罕见的。据《梦粱录》卷二十记载,下定礼时,要送以珠翠、首饰、金器、销金裙及缎匹、茶、饼、羊、酒等物。下聘礼时,富贵之家要备“三金”:金钏、金镯、金钗坠。一般人家,如无金器,则以银镀代替。士宦之家还要送销金大袖、黄罗销金裙、段红长裙等贵重衣服及珠翠等昂贵首饰、上等细巧杂色彩缎匹帛。最轻的财礼,下等人家也要送绢一、二匹,官会银锭一、二封,加以鹅酒茶饼等物。

丧葬观念也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丧葬在传统上长期被人们视为人生的一件大事,马虎不得,十分注重。而传统上人们也往往以尽力铺张办丧事为孝,并以能符合礼俗为乐。但值得注意的是,临安士民对丧事却是十分实际,过去花费浩大的土葬,因花费昂贵、土地难求等原因,在城中并不普遍。而花费较少的火葬,则在临安城中大行其道,尤以中下层为最。尽管官府极力反对,此种与传统礼俗大相径庭的火葬仪式,自宋室定都临安以来,一直盛行不衰。绍兴二十八年(1158),监登闻鼓院范同言:“臣闻吴越之俗,葬送费广,必积累而后办。至于贫下之家,送终之具,唯务从简,是以从来卒以火化为便,相习成风。”(《宋史》卷一百二十四)后来连富裕人家,也不行土葬,而乐于火葬了(《清波杂志》卷十二)。当时西湖东北角的圆觉禅寺内,即为火葬场所。

在“工商亦为本业”思潮的影响下,社会

上趋利逐末,士商渗透和官商融合蔚然成风。这股经商之风远较同时期的其他地区为盛。据周淙《乾道临安志》风俗条记载:杭人“善于图利”,“习俗浮薄,趋利而逐末。”(施涛《淳祐临安志》卷六《学校》)临安城中从事工商业的人数日趋庞大。据马可波罗说:临安城内有十二种职业,每一种职业一万二千户(《马可波罗游记》)。据此推算,临安城内从事工商业的居民达十四万户,约五六十万人。这个数字可能有夸大之处。又据《都城纪胜》记载,临安有四百十四行,每一行大约数十至百户。以百户计算,城中的工商户约为四万一千余家。一家以五口计算,则达二十万七千余人,约占城区居民总人数的三分之一左右,这远远超过了唐代的长安和北宋的汴京。建炎后,在临安城中流行着这样一句俚语:“欲得官,杀人放火受招安;欲得富,赶著行在卖酒醋”(庄绰《鸡肋编》)。这是临安经商之风盛行的生动写照。

在卫生保健方面,杭州人勤于沐浴,人人都雅好卫生之道。杭人的沐浴,通常多含有取乐休息之意。杭州一地有许多澡堂浴室,据马可波罗所记,杭州约有三千间营业性澡堂,每一澡堂一次足供百人沐浴之用。这些澡堂除给人按摩外,还供应茶水酒类,杭人几乎每日留连眷恋。他们喜欢冷水浴,冷水则由西湖中汲来。此外尚有热水浴,专供外国人和回教徒使用。马可波罗在游记中说:“有许多街道通入御街一带的广场,街道两侧有许多冷水浴室,内有男女听差,侍候前来的男女顾客,当自孩提时,一年四季皆惯用冷水洗澡,以此为卫生健身之道。澡堂里也有些房间备有热水,专供受不了冷水或不惯于冷水浴的外国人使用的。杭州人皆习惯每日洗澡,不先行沐浴就不用膳。小贩则在澡堂门口出售热的洗脸水,或各种进补的汤药。

富裕人家多自备有澡堂,因此光顾公用浴室的多为一般庶民百姓。浴盆则有木制、

铜制或陶瓷等质地。澡盆内多置小长凳,以为浴者倚卧之用,旁边备有毛巾供擦身体之用。妇女沐浴则以屏风围起,肥皂则是豌豆和香草混合制成的液体。通常将一块热铁或热石投入澡盆中,作为加温之需。

此外,杭人还十分讲究食品卫生。饮食直接关系到人们的身心健康,因此临安城中的饮食店除烧制花样新颖、味美可口的食品外,还注意所使用的操作炊具、饮食器皿以及食品包装等的卫生,力求新洁精巧,以具有更强的吸引力。吴自牧在《梦粱录》卷十八《民俗》条中说:“杭城风俗,凡百货饮食之人,多是装饰车盖担儿,盘合器皿,新洁精巧,以炫耀人耳目,盖效学汴京气象,及因高宗南渡后,常宣唤买市,所以不敢苟简,食味亦不敢草率也。”

在这一时期,释(佛)、道之教盛行于临安。吴自牧在《梦粱录》卷二中说:“杭城事圣之虔,他郡所无也。”又说:“释老之教遍天下,而杭郡为甚。”(《梦粱录》卷十四《城内外诸宫观》)《咸淳临安志》卷七十五《寺观》“序”载:“今浮屠(佛教)、老氏(道教)之宫遍天下,而在钱塘为尤众。二氏之教莫盛于钱塘,而学浮屠者为尤众。合京城内外暨诸邑寺,以百计者九,而羽士之庐,不能什一”。

杭州的佛教,至南宋时达到了鼎盛时期。据《梦粱录》卷十四《城内外寺院》条统计,城内外寺院庵舍近五百所之多,至于“诸录官下僧庵,及白衣社会道场奉佛,不可胜纪”(同上)。

因“老氏之教,有君臣之分,尊严难犯,报应甚捷,故奉老氏者”也较多。在统治者的倡导下,杭州在定都后的一百多年时间里,先后兴建了近三十个宫、观。

此外,临安的祠庙也较多,达一百多处,遍布城内街巷,或祀“土域山海江湖之神”,或祭“先贤往哲”者。

临安释道之教等的盛行,反映了当时城

内市民们多彩多姿的宗教生活和对宗教的狂热心情。

读书之风也盛行于杭州,这与宋室定都前迥然不同。据《淳祐临安志》载,北宋熙宁年间,郡守陈襄曾作劝学文,“杭,东南之会藩也,其山川清丽、人物秀颖,宜有美才生于其间。然自建学以来,弦歌之声萧然,士之卓然有称于时者盖鲜,反不逮于支郡,何也?岂非濒海之民,罕传圣人之学,习俗浮薄,趋利而逐末,顾虽有良子弟,或沦于工商释老之业,曾不知师儒之道尊,而仁义之术胜也”。《淳祐临安志》卷六《学校》)但至南宋,这种经商弃儒的社会风气有了根本性好转,叶适说:“今吴越、闽、蜀,家能著书,人知挾册,以辅人主取贵仕。”(《叶适集》卷九《汉阳军新修学记》)南宋政府除在临安开设太学、武学和宗学外,还兴办了律学、算学、书学、医学和画学等专科学校。此外,钱塘、仁和两县各设有县学,乡里又有家塾、舍馆、书会等,“每里巷须一、二所,弦诵之声,往往相闻。”(耐得翁《都城纪胜》“三教外地”条)因此临安成为当时的文化中心,人才也出现了不少,光进士就达582人。文化名人,人才济济。文学家有朱淑真、张炎、汪元量、周密等人,科学家有杨辉,名医有陈沂、罗知悌、邢氏等人,思想家有张九成、邓牧,画家有刘松年、夏珪、马远、李嵩、马和之、林椿等人,这远远超过了北宋时期。

综观南宋临安的社会生活方式,我们可以看出:随着都城商品经济的发展和活跃,历史上传说的“重农抑商”政策受到了强有力的冲击,“工商亦为本业”的思潮也随之而起,商人的社会作用得到了朝野上下及民间的承认,商人的社会地位也相应提高。同时,由于都城商品经济的发展和繁荣,使广大市民,尤其是商人,积聚了大量财富。于是人们在解决了温饱问题之后,自然而然地讲起“生活方式”来了。吃讲营养,穿讲漂亮,(下转106页)



《美术史论》1987年第2期。

(28) 陈国强:《漳州华安汰溪摩崖石刻与高山族》,《福建学刊》1988年第5期。

(29) 福建省文物管理委员会:《福建崇安城村汉城遗址试掘》,《考古》1960年第10期。陈直:《福建崇安城村汉城遗址时代的推测》,《考古》1961年第4期。

(30) 福建省博物馆:《崇安城村汉城发掘简报》,《文物》1985年第11期。

(31) 林惠祥:《论长住娘家风俗的起源及母系制到父系制的过渡》,《厦门大学学报》1962年第4期。

(32) 林瑞峰:《惠安沿海异服之人族属初探》,《薯花》1983年第2期。陈国华:《惠东女族源初探》,《泉州学刊》1986年第4期。

(33) 本文已交《厦门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34) 陈国强:《福建惠安崇武人类学考察》,已交《福建论坛》。

(35) 林惠祥:《福建南部的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报》第八册,1952年。

(36) 惠安县文化局文物志编写组:《惠安县文物志》(征求意见稿)第12—13页。

(37) 黎族简史编写组:《黎族简史》第11页。

(38) 原件藏于厦门大学人类博物馆,用毛笔写在白布上,楷书直行,自右而左。

(39) 陈国强、周立方、林加煌:《福建畲族的图腾崇拜》,1988年10月香港中文大学人类学系学术讨论会论文。

(40) 《湄洲妈祖》编委会:《湄洲妈祖》,1987年莆田印。

(41) 陈国强、林加煌:《台湾的妈祖崇拜》,《福建论坛》文史哲版,1988年第1期。

(42) 慈济东宫理事会历史文物整理小组编:《青礁慈济祖宫:东宫史料》,1988年油印本。刊于《惠安方志通讯》1985年第2、3期。

(43) 陈国强:《泉州回族考》,刊于《厦门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8年第1期。

(44) 陈国强:《泉州回族与伊斯兰教、阿拉伯人》,1988年东南沿海地区伊斯兰教文史工作座谈会(泉州会议)论文。

(45) 吴文良:《泉州宗教石刻》,陈达生:《泉州伊斯兰教石刻》。

(46) 参见《回族简史》第11页,宁夏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

(47) 参见光绪十一年十九世丁鹤年的《陈江丁姓族谱》。

(48) 参见《温陵螺阳奇山郭氏族谱》等。

## (上接123页)

住讲宽敞,用求高档,已成为临安市民们追求新的生活方式的新动向。其社会生活方式和风尚变化之大,达到了中国封建社会所能容纳的最大限度,迸发出新旧时代交替前朦胧的曙光。这是社会越来越进步的表现。这种富于进取和冒险、开放和积极主张个人享乐至上的社会生活新方式的出现,使中国封建社会中安于现状、墨守成规、疏于交往、抑制消费、排斥竞争的“禁欲主义”生活方式以及封建礼制受到了强有力的冲击,对封建制度的分解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伴随着新的生活方式的形成,在市民中出现了崇尚个人价值、追求世俗享乐,主张

个性解放的人文主义思潮,已具有鲜明的反封建色彩。

令人惋惜的是,这个新的社会生活方式,由于没有形成新的阶级基础,缺乏深刻的思想内容,局限于临安一隅,无法在广大的农村扩展开来。

临安的社会生活方式虽然由于南宋的灭亡而宣告夭折,但它在人们社会生活中留下的余音,却经久不绝,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晚明江南地区资本主义萌芽的出现,决不是偶然的,它具有深刻的历史渊源和社会原因,而南宋临安的社会生活方式应是这重要的历史渊源之一。